

雪山夜话

李御

一九九四年十月中旬，我与另一位记者黄前明参加重走长征路采访，第一站到了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的达维镇。翻过与夹金山比肩的巴郎山，顺沃日河而下，我第一眼就见到了达维桥。达维桥桥面不过两三尺宽，用大方木搭就，桥下河水清冽，桥上不时有牧归的藏胞赶着牦牛和羊群走过。这座不起眼的木桥，当年却承载了红一、四两个方面军会师的巨大喜悦。

时近黄昏，我们借宿于侨桥而居的游学民大爷家。老人虽已七十多岁，但身板硬朗，言辞清楚。说起当年会师的情景，如在昨天。老人说，红军会师后，在对面山坡的喇嘛寺前开联欢大会，我们这些毛娃子像过节一样，在队伍旁边跑来跑去，听他们唱歌，看他们跳舞，那个热闹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据当地领导讲，在联欢会上，毛泽东主席双手叉腰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我们红军是打不垮、拖不烂的队伍。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，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，但敌人的围追堵截没能消灭我们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。”这一讲话内容见于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的回忆录，措辞与流传的几种转述略有出入，但“打不垮、拖不烂”这一核心表述是明确的。

夜宿达维桥畔，屋外夜色中透着川西北高原十月的寒意，室内炉火熊熊。游大爷一边往火塘里添柴，一边给我们讲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留在记忆中的种种往事。他说，别看那些战士军装破破烂烂，忍饥挨饿，又刚翻过雪山，但走起路来，照样精气神十足，见了我们当地人，又特别和气——你说这样的军队能不赢吗！

老人说，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，就像一块磁铁，当时达维附近好多青年争相报名参加参军。邻近冒水村有位叫刘树青的小伙子，当年才十三岁，全家被土匪杀害，他也被迫杀至悬崖边，纵身一跃，摔在一棵树上，一只眼睛戳瞎了。土匪以为他已摔死，而刘树青忍着剧痛，攀缘而下，投奔了红军。后来听说他在部队杀敌英勇，当上了排长。攻打腊子口时，打断了左臂，他就凭着一只眼睛、一只手，顽强征战。我问大爷，有刘树青的消息吗？老人沉吟不语。我猜想，这位刚烈勇毅的红军战士很可能已经血染沙场。有资料记载，当年川西北有五千多名各族青年参加了红军，生还者寥寥无几。红军各路部队在阿坝州境内转战停留达一年零四个月（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），其间当地藏、羌、回、汉各族群众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牲畜，每两个牧民就保障了一个红军战士的给养。后来，毛泽东多次讲到这段历史，赞誉川西北人民的支援是“牦牛革命”。

第二天，我们特地去了当年两个方面军会师联欢的那片开阔地，如今这里已成了苹果园。穿行在浓郁的果香之中，我能从栽树与结果中品味出许多。

我们还特地访问了毛泽东当年在达维的住处。达维会师期间，毛泽东与周恩来、朱德等住在达维喇嘛寺内，而不是普通农户家中。当地群众给我们讲了父辈传下来的一些当年的趣事，譬如毛泽东提着马灯上楼，因身材高大，差点撞上楼口的横梁；他还与邻家的小娃儿一起逗乐子，主人家吃什么，他也跟着吃什么，并让警卫员送了饭钱。当时的红军领袖就是这样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，如鱼得水。

在去若尔盖的途中，我们结识了一位研究党史的青年干部杨继宗。他历经三年甘苦，撰写了《红军长征在松潘》，并几经周折查证出当年为红军过草地带路的两位藏族喇嘛向导——一个叫扎洞巴，一个叫能周。他还沿着红军过草地的路线徒步走了一趟，在人迹罕至的草地，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红军战士遗骨。

也是夜宿杨继宗家，也是窗外雪花纷飞，室内炉火正旺。我们围坐火塘，聊起了长征，聊起了那段峥嵘岁月。与达维桥畔游大爷家那个柴火毕剥的夜晚不同，杨继宗说话时习惯把手中的笔记本翻开又合上，像是在那些他反复走过的路线和反复核对过的人名之间，寻找一种可以安放情感的秩序。

杨继宗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。当时红军在當地停留时，留下了一批伤员，杨继宗的母亲就收养了一位名叫何文礼的重伤员。小伙子伤势很重，杨妈妈上山挖草药，四处寻秘方，给他疗伤，把家中下蛋的母鸡杀了炖汤给他喝，家里人吃稀的，他一天三餐吃干的。何文礼伤情慢慢痊愈，认杨妈妈做了干娘。杨妈妈还准备给小伙子介绍一位邻村姑娘，让他在这里结婚生子，与她们一起生活。但何文礼伤好之后，执意要去寻找队伍。临行那天，何文礼双膝跪地，哭着说：“娘，我走了，等胜利了，我一定来看您！”干娘与送行的村人潸然泪下。何文礼从地上站起来，擦干眼泪，背着干娘准备的干粮，独自一人上洛找部队去了。杨继宗动情地说：“从这位红军战士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信念的力量。任何艰难困苦、儿女情长，都阻挡不了，也改变不了他们矢志向前的人生选择与坚定的脚步。”

后来我问，你听说过这位红军战士的消息吗？杨继宗也是沉吟不语。后来的结果不难想见：这位红军战士很可能没能等到胜利，也没能再来看他的干娘，一腔热血洒在了征战途中。

两段雪山夜话，两个红军战士的名字——刘树青、何文礼——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中。他们虽然只是钢铁洪流中两朵细微的浪花，两位极普通的红军战士，但他们代表的，却是一支打不垮、拖不烂的正义之师。在采访札记中，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：当成千上万的热血男女，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死亡地帶时，实际上，一种旷古未有的群体生命取向的崭新形式，在精神与物质同样匮乏的土地上诞生了。他们钟情生活，却走向牺牲；他们热爱生命，却又要以血肉之躯向生命的极限挑战，去征服自然界的魔障。这种相悖相反的取向，最本质的动机是谋求一种新的生存状态。当生命中最本质的追求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中凸显出来时，就有了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气势和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与感召力，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源泉。

李御：中国作协会员，楚天电台原总编辑，高级记者。



红军过草地(油画)

张文源作

黄花草，松潘草地的长征草

李舫

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，两株干枯发黄的植物标本并排放着。它们很小，小到如果不看展签，很容易被当成果壳或碎叶。展签上写着：“红军过草地食用野菜标本。捐赠人刘毅。”

从葛曲河畔的松潘泥沼，到国家博物馆的恒温展柜，这两株植物走过了四十年，跨越了三千公里。展柜不是终点。它只是把一个问题留给了今天：一株被战士临时命名的草，如何在九十年后的植物志和党史叙述之间，被重新辨认？

一

这两株黄花草的采集者，是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团部干部刘毅。

1936年7月的第一个清晨，松潘草地的雾霭尚未散尽。葛曲河在沼泽间蜿蜒如银色蟒蛇，水面蒸腾着刺骨的寒气。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蹚过齐膝的泥沼——他们是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的战士，已经在这片“死亡陷阱”中挣扎了数日。军帽上的红五星沾满泥浆，绑腿被水草缠绕；每个人的脸颊都凹陷下去，刀削斧凿一般。可眼睛亮得灼人——饥饿与信念在同一个身体里互相撑着，就撑出了那样的光。

24岁的刘毅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河畔一片明黄色的星点上。远处，野草成片成片生长，紧紧贴附着大地，细密的叶片披着露水，晶莹剔透。野草的顶端，簇拥着纽扣大小的黄花，在灰绿色的草甸上如同跳动的火焰。

刘毅俯下身来，用冻得发紫的手指掐下一株，放入口中慢慢咀嚼。先是青草特有的涩，随即是一股淡淡的苦，最后喉咙泛起隐约的麻。部队《吃野菜须知》手册上标注过：微毒，不得已时可食。作为团部干部，他比普通战士更早接触到野菜委员会下发的这本小册子，也因此认得出眼前这片黄花草是什么。

他小心翼翼——那双惯于拿枪的粗糙双手，轻柔得近乎仪式。他采下两株品相完整的黄花草，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巴掌大的铁皮烟盒——那是打土豪时分得的战利品，盒面上的字迹已斑驳难辨。他将这两株野草卷起来，平放在盒子里，合上盖子。在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的沼泽里，在下一顿不知何物的行军中，保存两株野菜，并不是出于实用——两株标本救不了任何人。它更像一种确认：此刻还活着；也像一种铭刻：我们曾如此存在。

远处，军号声响起，清脆嘹亮——部队又要继续前进了。刘毅将烟盒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寒冷的秋风里，烟盒留存着他微弱的体温。

二

若要理解黄花草在1936年的重要意义，不能不首先直面松潘草地作为“人类生命禁区”的残酷现实。

松潘草地位于川北至甘南之间，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，纵横约300公里，面积约1.52万平方公里，海拔在3500米以上。这里遗留下了第四纪冰川退缩后形成的冰蚀洼地，蛇曲河道与苔草沼泽。湿地植被以沼生植被为主，黄花草多生长于蒿草——驴蹄草群落的草丘或丘间季节性积水地段，高湿、富有机质的生境为其积蓄淀粉和糖分提供了条件。

红军过草地之前，这里人迹罕至。草地表面覆盖的草甸，看似坚实，实则浮于深不可测的泥潭之上。一旦踏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老红军回忆，一个战士不小心踩破草皮，陷进泥沼，旁边的同志伸手去拉，也跟着陷进去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由于过草地时节正是雨季，骤降的暴雨让地面更加湿滑，河水暴涨，掉入沼泽，被河水卷走的人更多了。

在松潘草地上的记忆里，这是一片“吃人的草地”。到处是沼泽与泥潭，没有固定道路，人们只能朝着北方，踏着草甸自己开辟路径。一旦有人没踏稳草甸，就会掉入泥沼，抢救稍不及时，转瞬便被吞没。过河同样艰难。草地河流水面不宽，但水流湍急，水冷刺骨。身体虚弱的战士经不起这种寒冷刺激，过河上岸时倒下的，不在少数。

行路难，宿营也难。到了夜晚，战士们只能找一块稍干的地方，几个人背靠背坐着，用彼此的体温取暖。找不到干地，就只能在泥泞潮湿的草甸上露宿。第二天清晨，常常有人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松潘草地气候变幻无常，昼夜温差极大。清晨大雾弥漫，午后烈日暴晒，傍晚骤雨倾盆，入夜后气温骤降至冰点。衣衫单薄的战士，伴着风雨冰雹，随时都有冻饿之虞。路难走，觉难睡，天难测。但所有这些，都还不是最要命的。饥饿才是最熬人的。进入草地前筹集的粮食远不足用，进入草地数日后便彻底断粮，每个人都被饥饿和疾病所折磨。

在松潘草地上，比黄花草安全的野菜，如灰灰菜、车前草，已经被先头部队采得差不多了。比黄花草剧毒的植物，如狼毒、乌头，触目可及。在草地常见的毒草中，花色鲜艳的不少含有强心苷类成分，气味刺鼻的则常常带有神经毒性——当然，这只是老战士们用命换来的粗略经验，并非植物学的严格分类。黄花草占据的是中间那个极其狭窄的位置：毒性慢，症状看得见，不直接致命。它不是被“选择”的，是被绝境筛选后剩下的。它成为“长征草”，不是因为它可口，而是因为它勉强能咽下去，又不至于立刻要命。

三

黄花草能在绝境中成为支撑生命的食粮，从来不是命运的偶然垂青，更非孤勇之士的灵光一现，而是红军在绝境中将求生的欲望，转化成生存的伟大创造。

在那段啃食草根、吞咽树皮的艰苦岁月里，一个临时机构应运而生——野菜委员会。

1936年四五月间，红四方面军驻于康巴炉霍，为接应红二、六军团北上做准备，在川西北高原已经停留了数月之久。藏区地广人稀，粮食储备匮乏，数万将士面临断粮危机；松潘草地沼泽密布、毒草丛生，误食毒草致死的事件频发。统筹野菜辨识、加强食品安全，成为迫在眉睫的使命。

朱德总司令牵头，把熟悉本地植物的老乡、有医药知识的医生和炊事人员组织起来，成立了一个二十余人的野菜委员会。委员会下面，还有一个由炊事员、饲养员、警卫员组成

一株草的重量

周璐

《黄花草，松潘草地的长征草》是作家李舫为本报“长征中的植物”系列写的第三篇。

李舫写长征植物，落笔总在最低处。荠菜贴地而生，酢浆草匍匐蔓延，黄花草混在毒草丛里，不细看分不出来。它们没有松柏的凌云之姿，也不似梅兰的隐逸之气，却在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中，托住过无数双踉跄的脚步。

这组文章最动人的地方，不在史料钩沉，而在视角的谦卑。目光从战役地图上移开，俯身贴近那片被千万次踩踏的草甸，会看见另一部长征史——一部以叶绿素写成的、沉默的生存史。那些被编号、分级、标注毒性指数的草木，那本薄薄的《吃野菜须知》，那个由朱德率队成立的野菜委员会——一支队伍的存亡，曾系于几片叶子的辨认。

李舫不把植物当背景。荠菜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，穿过苏轼的蒸饭、陆游的惨羹，最后落进长征战士的搪瓷缸。酢浆草在《唐本草》里是凉药，在《救荒本草》中是荒年活命的上品，到了松潘草地便身兼三职——果腹、止渴、疗伤。黄花草本是毒草序列里“不得已时可食”的末选，刘毅却用铁皮烟盒珍藏两株标本40年，1975年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，展签上只写“红军过草地食用野菜标本”。两株草救不了谁，他还是把它们带出了草地。

18.7万人出发，12万余人牺牲，平均年龄不足25岁。这组数字固然惊心，但数字终究会抽象成报表。读到张思德尝毒草倒地醒来后第一句话仍是“快去告诉其他同志”，读到红二方面军后卫部队进入草地时平地无毒野菜近乎绝迹、只能往沼泽浅滩搜寻，读到董必武脚部溃烂化脓靠酢浆草与艾草交替外敷才慢慢愈合，历史才不再是数字，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，怎么熬过那一天。

荠菜在最贫瘠的时间里以最丰盈的方式迅速完成生命传递。酢浆草贴地匍匐，茎节生根，被蹂躏碾碎，数日便重新抽芽。黄花草毒性发作慢、症状看得见，占据的是绝境筛选后剩下的那个狭窄位置。它们都不是强者，却在极限环境中生生不息。冻土之下，一株草完成一季的契约，不靠谁许诺春天，只凭根须里那一点不肯熄灭的确定性。一支队伍走过雪山草地，靠的也不是哪一场战役的胜负，而是无数普通士兵在断粮之后仍然向北迈出的那一步。

李舫为这组文章写创作谈《草木为证》。证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牺牲者，如同草甸下看不见的根系，托举着这片草地继续生长；证的是再卑微的东西也可能托住一条命，再苦涩的东西也可能转化成走下去的力气。

90年前，红军战士俯身采摘这些野草时，未必想过它们会被写进文章、收进博物馆。他们只是饥饿，只是要活下去，要继续走。90年后我们重读这些草木的故事，才恍然发觉：荠菜年年报春，酢浆草岁岁弹播种子，黄花草在葛曲河畔开了又谢。它们不需要谁记得，明年春天照样长出来。

一株草能有多重？轻的时候是鸿毛，重的时候是一个时代。